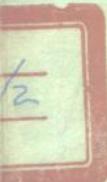


考古学参考资料

3-4



K 85/2

考古学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卷三
3-4

文 物 出 版 社

1980年·北京

考古学参考资料

编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出版者 文 物 出 版 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号

3-4

一九八〇年七月

印刷者 文 物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内 部 发 行

发 行 者 全 国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统一书号：11068·805

定 价：1.80元

目 录

- 中亚文明的历史地位 (苏联) B·M·马松 (1)
- 苏维埃时期塔吉克斯坦的考古发现与中亚古代史上若干问题 (苏联) B·A·李特文斯基 (25)
- 1967—1977年苏联学者对古代中亚历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苏联) B·A·李特文斯基 (64)
- 帕米尔和石器时代人类人居
亚洲高山地区问题 (苏联) B·A·拉诺夫 (97)
- 佉卢文书 (日本) 长泽和俊 (134)
- 古代突厥文碑铭述略 耿世民 (153)
- 塔里木盆地诸国 (日本) 松田寿男、长泽和俊 (168)
- 若干西域考古学家简介 (日本) 加藤九祚等 (200)
- 日本的西域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 (1886—1978年主要文献综述) [上] 黄振华 (230)
- 热释光和考古学家 (英国) 马丁·艾特肯 (333)
- 探讨水稻种植的起源——花粉分析 (日本) 中村纯 (352)
- 李济博士的逝去 宋文薰 (362)

中亚文明的历史地位

B. M. 马松

(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学博士)

苏联考古学者的研究工作不仅用新的观点揭示了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大夏、康居、安息和花剌子模的古代文化（这些地区都有城市文明、发达的文字、货币流通和商品经济），而且使我们能够从生产性经济进化的最初阶段开始，对所有这些现象的起源进行研究。现已完全清楚，其中许多现象可以追溯到中亚各定居绿洲的阶级社会发展时期，当时这些绿洲正并入阿契美尼德大国的版图。此外，在中亚南部地区发现了公元前九世纪至七世纪规模巨大的设防中心和发达的灌溉系统；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早期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归于更远的古代。这一点可以从《阿吠陀》的资料中得到一定的证实。这些资料证明这里存在过一个庞大的政治联盟^①，并在一定程度上与阿契美尼德前的大夏的传说相吻合。

在研究中亚远古史的过程中，还确定了古代文化联系的性质和方向，以及中亚在旧大陆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同时，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关系到这个地区古代历史的两个基本的文化成分：伊朗—美索不达米亚成分和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成分。早在旧石器时代，前亚文化圈就有强大的吸引力。莫斯特文化遗存相当广泛地见于中亚，它们同伊拉克（哈扎尔、梅尔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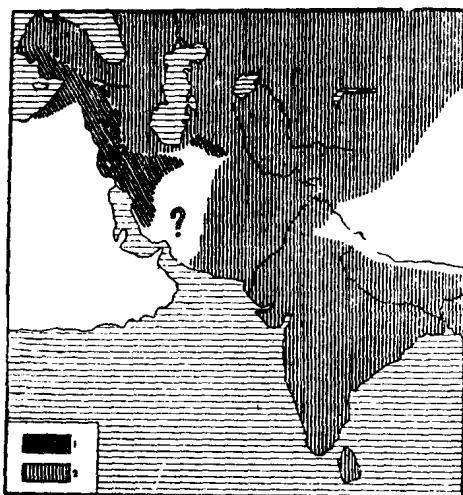
沙尼达尔-Ⅱ) 和伊朗(毕素屯)的莫斯特文化(广泛使用石片制造工具)最为接近。A.П.奥克拉德尼科夫早已根据捷希克-塔什的资料指出了这些前亚的特点^②。对中亚的莫斯特文化来说,正是这些联系是主要的、最典型的^③。对中亚的中石器时代说来更是如此。这里的中石器时代以里海沿岸文化^④和塔吉克斯坦一系列遗存^⑤为代表,其特点是广泛流行几何形细石器。同时,各地细石器的进化经历了相似的过程,至少在里海沿岸和伊拉克北部(巴勒加弗拉、沙尼达尔B、卡里姆—沙希尔)是如此。

前亚中石器文化时期,形成了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纳图弗文化^⑥(公元前第九千年至第八千年)和伊拉克北部的卡里姆—沙希尔文化遗存(公元前第九千年至第八千年),反映出采集野生谷物和驯养家畜的作用逐渐增大的情形(伊拉克的泽维—切米—沙尼达尔驯养山羊,晚期的纳图弗文化可能驯养另一种羊)。结果,在公元前第七千年至第五千年形成了一系列早期农业文化。同时,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认为,在近东人类居住地带范围内,这些农业文化的形成过程具有多中心的性质^⑦。在近东的具体条件下,当时农业畜牧业部落从猎人、渔人和采集人的总体中分化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表现。随着农业和畜牧业部落分化出来,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愈益扩大。所以,现在我们在亚洲可以看到两个区域。一个是有生产性经济和迅速发展的文化的定居公社地区。另一个是仍处于攫取性经济状态的新石器时代部落的广大地区。这两个区域的存在及其相互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特点(图一)。

这两个区域的界线通过中亚境内。在这个地区的西南部形成了早期农业的哲通文化。这个文化具体体现了几乎遍及整个近东的向新型经济转变的过程。有许多因素促使科彼特山前地带产生远古定居的农业文化。这些因素是：科彼特

山脉大量存在各种野生禾木科植物和驯养为家畜的野生动物；存在有利于原始灌溉农业的生态学条件；与当时高度发达的伊拉克及伊朗文化有密切联系^⑧。有根据认为，早在中石器时代，在中亚西南部就形成了这样的条件（K. 库恩关于公元前第七千年在加里一卡马尔班德就已驯养山羊的报告）。

哲通文化的人已经采用草泥建筑术和制作平底陶器，他们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尽管当时肉食主要还是靠狩猎。公元前第四千年至第三千年，以哲通文化为基础，中亚西南部定居农业公社逐渐进化。这里出现了红铜工具，饲养了绵羊、猪和牛马；狩猎的作用急剧下降（纳马兹加 I — II 期文化）。新的经济形态促使人口快速增长和文化全面进步：公社分迁各处，纹饰丰富的彩陶、小型的陶塑以及绘有壁画的氏族庙堂，



图一 公元前第七千年至第五千年的西南亚
1. 定居农业文化， 2. 猎人、渔人、采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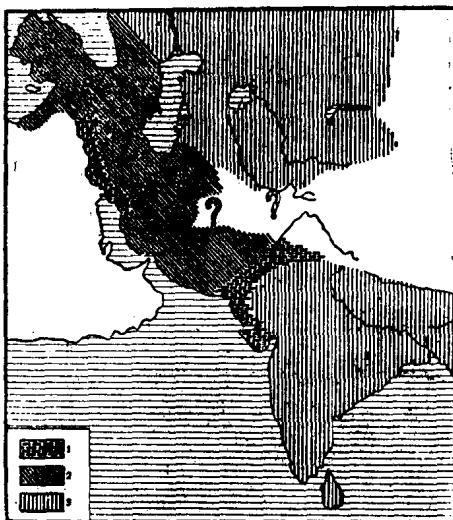
说明文化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中亚西南部铜石并用时代的公社构成了地域辽阔的早期农业地带的一个中心，这个地带从巴尔干一直延伸到印度河。一方面，这些公社有许多显著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器皿的形制和纹饰方面，表现为小型雕塑十分流行；另一方面，这些公社与伊朗的农业部落有密切联系，还间接地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有联系。在文化经济交往的同时（在公元前第四千年至第三千年的遗存中普遍出有天青石，说明当时交往的发达），由于个别部落集团的迁徙，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以不同形式表现在中亚西南部的农人文化中。在最早期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安诺1A遗存中，似乎已经可以看到来自锡阿尔克Ⅰ型文化的伊朗影响的痕迹^⑨。公元前第四千年乌别伊德文化（苏麦尔文化或原始苏麦尔文化）类型的遗存普遍见于近东地区。这种文化诞生在两河流域南部。从最东部的安诺遗存群的陶器上以及普遍建造圆形房屋这一点上，似乎可以看出乌别伊德遥远的影响^⑩。此外，纳马兹加Ⅱ文化类型陶器上的山羊图象和许多几何形母题，同以栏彩陶的纹饰相当近似^⑪。关于这些影响和交往的动力，目前还研究得很差。但在下一个阶段，即在公元前第四千年末至第三千年上半叶，有一些部落集团从伊朗中部迁徙到中亚西南部，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外来的人很快被当地居民所同化，但他们的迁移在彩陶纹饰、陶塑及其它许多方面都有反映^⑫。这里，到处都出现了那些说明是受了伊朗—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直接影响的特点。这些文化和当地基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方面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妇女小塑像。这些雕塑的肖像上明显地反映出乌别伊德传统的影响，但人象姿势不

是象乌别伊德文化中那样站立的，而是坐着的，与中亚遗址较早期的文化层中所出的人象相同。伊朗同美索不达米亚有如此广泛而多样的联系是并不奇怪的，因为中亚西南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长时期中曾经属于同一个文化经济区（图二）。而中亚的广大地区，包括中亚整个河间地区，在公元前第四千年至第三千年则属于另一个区域，接近于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文化圈。

在里海沿岸，哲别耳洞穴里上部的几个文化层和另外几处遗存代表了公元前第四千年至第三千年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这种文化是在里海沿岸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中石器时代一样，其经济基础是狩猎和采集活动，可能还驯养了山羊^⑯。

一种称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稳定的文化共同体遍及中亚的大片地区。这种文化的遗存最初是由C·Н·托尔斯托夫于1939年在花刺子模发现的，现今在乌兹博伊河畔、克泽尔库姆



图二 公元前第四千年至第三千年的西南亚
1. 城市文明； 2. 定居农业文化；
3. 猎人、渔人、采集人

沙漠和西哈萨克斯坦以及捷拉夫善河下游地区也有发现。哲别耳的上部几个文化层也出有克尔捷米纳尔类型的箭镞，但是哲别耳的陶器却有别于克尔捷米纳尔的器皿。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特点是从事狩猎和捕鱼，用燧石制造各种细石器，焙烧火候不高的圜底（早期阶段）陶器，建造半地穴式的住房^⑩。克尔捷米纳尔的文化历史联系扩展到了北方，在那里，可以从乌拉尔河沿岸和鄂毕河下游地区的资料中看到克尔捷米纳尔部落的遗迹^⑪。由此可见，〔克尔捷米纳尔〕同新石器时代整个渔猎部落世界有了密切的联系，这些部落分布于亚洲大陆的大片土地，其南部边界即系中亚克尔捷米纳尔人的居住地区。

同时，地处南方而与定居的农牧业文化区域相邻这一情况决定了中亚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特点。新石器时代村落的居民不断受到邻人高度发达文化的作用，大概还部分地受到了农业区域部落迁徙的影响^⑫。早期克尔捷米纳尔器皿上的刻纹和划纹以及某些器皿形制都显示出南方彩陶不容置疑的影响^⑬。在一个克尔捷米纳尔村落遗址中，甚至发现了带有各式流的容器，这些容器与伊朗东北部（沙赫—捷佩）农业文化的容器十分相似^⑭。哲别耳就已经出有外来的沙赫—捷佩型容器的碎片。而在花刺子模出现这种碎片，清楚地表明乌兹博伊河是北方新石器时代部落相互联系的传统途径。

正是这些与南方的联系和南方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北方部落过渡到新的经济形态，这种看法是十分自然的。克尔捷米纳尔文化晚期已经有了红铜器，可能还有萌芽的畜牧业。还有一点也很有意义，即捷拉夫善河的克尔捷米纳尔人使用嵌有燧石的镰刀，其数量与主要工具相比虽然不大，但出现

这种镰刀的事实却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还有磨盘^⑩。

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即关于文化发展有两个主要方向（伊朗—美索不达米亚方向和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方向）的这种看法是否具有人为的局限性，而没有考虑到中亚旁边一方面存在着诸如阿富汗和印度，另一方面存在着诸如中国这样的古老中心？

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主要包括现代的巴基斯坦）同中亚南部的定居公社一起，都属于制造彩陶的农牧部落区域。现有资料证明，这些地方向新经济形态的过渡比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中亚西南部等地为时较晚。根据放射性碳素测定的资料，最早期的、非常古老的俾路支定居农业居址（基利 I）属于公元前第四千年中叶（3350±200年）^⑪，而大多数早期农业文化则属于公元前第四千年末至第三千年初。很可能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是在伊朗高原各部落的分迁的促进下向生产性经济过渡的^⑫（伊朗高原很早以前就完成了这种过渡）。例如，在阿富汗南部蒙季加克遗址的最底下一层（公元前第四千年末）中，见到了已完全形成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遗存，其中也有与锡阿尔克十分相似的轮制彩陶^⑬。公元前第三千年农业公社区域里的文化影响是从伊朗北部和中亚南部等地向阿富汗和印度^⑭方向，而绝不是按与之相反的方向传播的^⑮。

同中亚的情况一样，公元前第四千年至第三千年在印度也是定居农业公社与具有古老文化形式的渔猎部落共存。这些部落居住在大陆印度的广大地区，目前以古吉拉特遗存研究得最为透彻^⑯。这些遗存的特点是用燧石制作细石器，并广泛流行几何形（弓形、梯形和三角形）工具。只发现了极少量火候很低

的陶器碎片，说明陶器的使用还很不普遍。C.П.托尔斯托夫指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属于古老的大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分布范围包括印度在内^⑧。这个结论从下述意义上说是正确的，即中亚的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和印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样，是以与定居农牧人区域相邻的渔猎部落为代表的。然而，未必可以说花刺子模的克尔捷米纳尔人与古吉拉特村落遗址的居民有直接的文化联系。他们之间隔着一个辽阔的铜石并用时代的彩陶文化区域。在塔吉克斯坦西部存在同克尔捷米纳尔文化截然不同的吉萨尔文化，这就排除了通过帕米尔—兴都库什山进行间接联系的可能性。也不能忽视克尔捷米纳尔和大陆印度的燧石制造有相当大的差别；这一点，A.B.维诺格拉多夫就曾正确地指出。关于安诺和仰韶彩陶之间联系的问题曾经有过不少论述，也有人作过推测，认为中国彩陶文化是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⑨。然而，C.B.吉谢列夫就曾说明，与仰韶文化相类似的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具有偶然性^⑩。在彩绘风格和容器形制方面，仰韶与特里波列较之仰韶与安诺有更多的相似之处，然而二者并没有实际上的联系。应该认为，我们见到的是一些巧合现象，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纹饰发展都有过相似的经历，而不是因为有什么古代的联系。现在，早期农业文化分布的界线已经相当清楚，这个情况也证实上述论点是正确的。公元前第五千年至第三千年中亚制造彩陶的部落向外分布时在卡拉库姆沙漠南部边缘停了下来。这样，这些部落与仰韶文化各主要中心之间，隔着一块宽达数千公里的地方，这里主要居住着新石器时代的渔牧人^⑪。

关于仰韶文化起源的问题，现在还不够清楚。这首先是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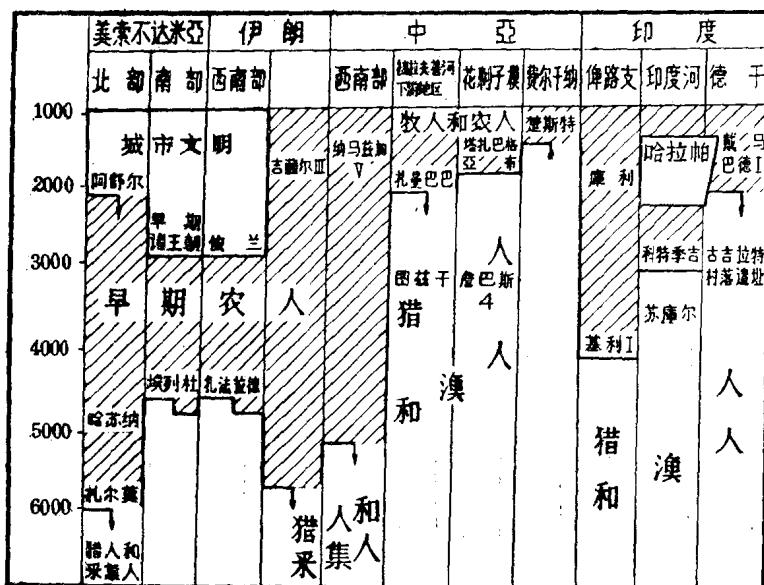
对仰韶前的遗存尚缺乏研究。然而，在将仰韶文化与近东农业文化圈的遗存进行总的比较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二者有非常重大的区别。根据历史传统所采用的年代计算方法，仰韶文化基本上可以归属于公元前第三千年^⑨。如果考虑到文化层的厚度达五至六米，那就可以设想，仰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应追溯到公元前第四千年。公元前第四千年至第三千年，近东早期农业文化（包括中亚公社在内）已广泛使用红铜，而从公元前第三千年初起，在苏麦尔和以栏已采用青铜。然而很明显，在仰韶文化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人们还不知道使用金属，我们见到的仍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公元前第四千年至第三千年，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中亚、印度西北部，早期农人都普遍用砖坯建造房屋。而仰韶遗址却只有构架的茅舍，其平面呈圆形或长方形，居住面和墙上抹有粘土。这些房屋和公元前第二千年印度中部铜石并用时代的房屋最相似，这可能要用热带的印度和东面的中国的自然条件（湿润的气候、季风）的性质来解释。早在公元前第六千年至第五千年，近东农业部落就已种植大麦和小麦（这是长时期中的主要农作物），他们最初的家畜是山羊。黄河沿岸的居民却种植稻〔原文如此〕和粟，他们的主要家畜则是狗和猪^⑩。

这一切使我们可以认为，黄河流域向生产性经济的过渡是在本地的基础上发生的，与近东文化中心没有什么联系，而且发生在较晚的时期^⑪。难怪乎在人种类型（与现代中国人近似的蒙古人种）上，仰韶文化的人们和近东早期农业部落的任何人群都是截然不同的；仰韶文化早期就出现了中国特有的诸如三足器那样的陶器形制。很可能，同公元前第三千年秘鲁向生

产性经济过渡一样，公元前第四千年至第三千年黄河流域产生早期农业文化也完全是一种独立的现象。研究中国的生产性经济的形成过程，这是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正如近东的新发现所表明，这种生产性经济根植于中石器时代。目前，黄河中游发现了一批仰韶文化前的遗存^⑩，遗存中某些因素表明与仰韶文化有联系（红陶的存在、粗制器皿上的绳纹、磨制石斧等），但这些因素都具有（至少是部分地具有）燧石细石器制造术的特点^⑪。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经济的性质，目前还不清楚。

由此可见，中亚南部早期农业文化在近东相似的文化系统中所占的地位是十分明确的，这个地区北部渔猎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接近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这种趋势也见于青铜时代。

在这之前不久，古代东方各文化经济区的相互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两河流域南部和以栏的农牧公社在良好的自然条件下迅速地发展生产力，这就导致了社会制度和文化发生根本变化（图三）。出现了具有发达手工业的大型城市中心、宏伟建筑营造术和文字。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時候，形成了早期的阶级社会。稍后，约公元前二千四百年，在信德和旁遮普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产生了哈拉帕城市文明。这样就出现了城市文化区，与之毗连的是广阔的农牧部落的野蛮人地区，后者和这些城市中心有密切的联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急剧扩大。苏麦尔、以栏和哈拉帕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这些地方农业剩余产品特别多，而灌溉农业的进步必然导致大型灌溉体系的建立。根据苏麦尔的经济文献，这里大麦的通常收获量为种籽的36倍，有时竟达104—105倍。在中亚西南部（公元



图三 公元前第七至第二千年历史文化区之比较

前第五千年至第二千年，早期农业公社的土地就在这一带）的还没有受到商品经济影响的十九世纪原始经济中，当地品种的小麦通常收获量为种籽的7—8倍，大麦为4—5倍。在阿富汗和印度气候相当寒冷并同外界隔绝的北方山谷中，发展农业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哈拉帕文化主要遗存集中地信德和旁遮普至今还是印度的粮仓。这里和俾路支不同，一年可收两季庄稼。看来，黄河流域的经济和社会也以类似的方式迅速发展。安阳的发掘有力地证明，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十二世纪，这里已经存在早期的阶级社会，有宏伟的建筑物、厚葬的王陵和甲骨文。因此，和公元前第三千年相比，情况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而在公元前第三千年，仰韶的农业公社在很多方面都落后于当时

伊朗、阿富汗和中亚南部的人。诚然，中国农业中心发展得比较晚，这就使中国早期的阶级社会比古代东方形成得晚。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十二世纪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当于泽姆杰特一纳斯尔时期（公元前三十二世纪至二十九世纪）和有著名王陵的乌尔第一王朝（公元前二十七世纪至二十六世纪）。这种情况证明，历史发展过程有规律地重复着某些发展阶段。

中亚西南部的定居农业公社与处在苏麦尔—以栏文明和古印度文明侧翼的伊朗、阿富汗和俾路支部落，同属一个区域。公元前第三千年至第二千年，这个区域到处都发生了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这种解体好似用放慢的速度，重复了公元前第四千年两河流域南部所发生的过程。在中亚，当时早期农人的中心是一些大型居民点，面积达一百公顷，四周围着土坯墙^⑧。这些居民点有发达的手工业（陶窑群、陶轮和复杂的红铜及青铜制品）。十九世纪，在伊朗东北部一个类似的大中心（丘连一捷佩），发现了一处金器、红铜器和石器的窖藏，称为阿斯特拉巴德窖藏，它清晰地反映了宝物积聚过程的特点^⑨。对一个不大的村址捷佩吉萨尔（面积约1.5公顷）进行的发掘也证明有这种现象^⑩。厚葬墓与众不同这一事实表明贫富差别相当悬殊。在一幢孤立的大屋里出土了丰富的文物，包括一些金属工艺品。这大概是一所统治吉萨尔的富有的父权制家庭的住房。在这方面蒙季加克的发掘很有意义，在第四期时^⑪这是一个居住区，四周有围墙，中央高岗上有一所宏伟的建筑物。建筑物的正面饰有半圆壁柱。遗址近旁还有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其平面布局近似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这个文化层中还有一个巨大的石刻男人头像，其风格近似哈拉帕的雕刻术。蒙季加克当时很可能是坎大哈绿洲

的中心，是一个野蛮人的王公在古印度文明边缘地区的府邸。

然而，无论在伊朗还是在阿富汗和中亚，当时都没有任何类似苏麦尔、以栏、哈拉帕或商代中国那样的早期阶级社会，而且也没有文字发展的任何迹象；在纳马兹加—捷佩、捷佩—吉萨尔和蒙季加克发现的印章只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几何图形。公元前第三千年至第二千年初叶的这些遗存表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就其主要特征来看，最接近于两河流域南部晚期的乌别伊德和乌鲁克。虽然当时社会发展已相当接近于阶级社会阶段，但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料证明，这个区域的某个地方曾形成过早期的阶级关系^⑩。

中亚南部农牧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性质也同伊朗类似文化的历史有许多共同之处。公元前第二千年上半叶，中亚西南部纳马兹加—捷佩和阿尔滕—捷佩这两个古代中心开始荒芜起来。以纳马兹加Ⅵ文化遗存为代表的的文化也已经十分明显地出现粗俗和衰落的迹象。几乎在同一时期，诸如丘连—捷佩、沙赫—捷佩和捷佩—吉萨尔等伊朗北部遗址也无人居住了，而且根据吉萨尔的资料，还可以看出部落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阿富汗南部的蒙季加克小城大部分也是一片废墟，在新的文化遗存中，轮制陶器几乎全部被手制器皿所替代（蒙季加克Ⅴ）。蒙季加克Ⅵ的地层的年代相当于几乎完全荒芜的时期，代表这些地层的不是建筑物，而是一些灰层。公元前第二千年上半叶至中叶之间，在偏南的某些地方也发生了部落集团的迁徙（沙希—土姆普文化向俾路支南部渗透），许多绿洲（例如，谢伊斯坦绿洲）荒芜了，信德和旁遮普等地的城市文明衰落了。很可能这段时间里有许多部落集团进行迁徙，大概还发生了许多其它事